

1007



高部史料

第四輯

164/04

高 邮 文 史 资 料

第 四 辑

高邮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六年七月

目 录

政 坛 风 云

- 往事漫忆……………郑文澍(1)
高邮的联庄会……………夏金明(12)

经 济 史 话

- 高邮金融业史话(上)……………杨玉清(20)
高邮浴室业的变迁……………陈春元(29)
解放前的高邮粮食行业……………毛玉文 孙桂明(37)
解放前的高邮商业……………吴克勤(42)
亚兴锅厂记述……………周鹏顺(46)
坚持民主办社的区南合作社……………王沛喜 连子建(49)
抗日时期高邮农村的第一个合作社……………王沛喜(52)
高邮第一次解放后的邮政通信……………陆家斌(57)

界 师 漫 忆

- 全省闻名的界首乡村师范……………高庆森(60)
在意气风发的岁月里……………胡频之(76)
扬中乡师地下党的活动片断……………胡频之(87)
两次学潮的前前后后……………胡频之(95)
忆母校——界首乡师……………顾培昉 李炳鸿(106)
我记忆中的界首乡村师范学校……………朱志惠(114)

文 卫 古 今

- 大同医院的变迁……………张厚诤(119)

艺苑之花——高邮县越剧团	吴国印 (122)
成长中的扬剧团	吴国印 (125)

人 物 春 秋

蚕桑专家赵鸿基	赵也生 (127)
宋文灏先生事略	陈庆祜 (131)
名中医许步仙	许长生 (134)
晚清老中医江德之	江一民 (136)
书画家李曾寿	许长生 (138)
杨蒂事略	董赞尧 (140)

珠 湖 忆 旧

一带江天脉脉秋

——《运河帆影》摘登	易君左遗作 (142)
解放前高邮的戏台和书场	何瑞芝 (151)
盐匪被歼记	姜 展 (155)
“黑脸太岁”张其沅	周庆禄 (161)
临泽庙会记	孙友文 (166)
追忆“迎芒神，劝春耕”盛会	陈念祖 (168)

秦 邮 胜 迹

我县明代遗冠遗笏之由来	王福西 王沛喜 (169)
孟城驿	吴伯颜 (173)

孟 城 名 产

秦邮董糖的由来及其加工工艺	郭任天等 (174)
高邮醋的特点及其制作方法	郭任天等 (178)
界首陈西楼五香茶干	杨志达 (184)
健脾八珍糕	相培之 (187)

往事漫忆

郑文澍

我今年七十三岁，甲寅年出生。说来也巧，若以庚寅年（一九五〇年）为界，我在旧中国生活了三十六年，在新中国又生活了三十六年。今年是丙寅年，抚今追昔，我这“老虎”，真是思绪万千！

我的祖辈父辈都是被压迫被剥削者，他们终身劳苦，还是吃不饱穿不暖，在苦难中煎熬。就我记忆所及，祖母很早就去世了，祖父一人种地主的田，因为地处山区，不是干旱就是山洪暴发，几乎年年歉收，所以田租越欠越多，生活越过越穷，更谈不上拿钱供我父亲读书了。祖父只好忍心地把父亲送到县城涂庆澜家去做长工。涂家原来也是乡下山区人，涂庆澜考中进士后，入翰林院任编修，时约清道光年间，以后搬进县城营造高门大府，显耀一方。我小时常听父亲说：“端人家的碗，受人家管，给人家做事，谈何容易？”我是父亲唯一的儿子，他疼爱我，希望我长大能有出息，摆脱受剥削受压迫的地位，因此教我“凿壁偷光”。有一次，我和涂庆澜的曾孙砸钱玩，没有完成写字的任务，父亲回来后很生气地说：“你想象我这样一辈子给人做牛做马吗？人要有志气，鸬鹚也可以飞过金凤凰”。父亲激励我“出人头地”固然不妥，但多少也反映了他不甘受欺凌的愤懑之情。由此以后，我逐步养成了“自觉”的习惯。

• 1 •

我家居于福建莆田西门外莒溪乡。环莒皆山，风景秀丽。我家离城约四十华里，每年农忙季节，我都随父亲回乡种田，一年总要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往返几趟，从小就得到锻炼筋骨的机会。上中小学时代，除了逢年过节、大风大雨，我都没有中断过锻炼，所以参加学校体育比赛，都是冠军。我八岁开始上学，由于家庭经济困难，故而时断时续，十五岁小学毕业，到二十岁才读完初中。当时实在无钱读高中，只好去报考师范，这样不仅不要家里负担，而且每月还有四元钱的生活津贴。上师范时，体育老师程天泗（国民党中央大学体育系毕业生），很喜欢我，希望我毕业后去报考体育系。我是很爱好体育的，可是我个子矮，如果在全国比赛中得不到冠军，生活还是没有保障，所以一直处在进退两难之中。

我的少年时代完全是在曲折的道路上走过来的。此时我们的国家也是在军阀混战中度过的，什么“五·卅”惨案呀！“九·一八”事变呀！“一·二八”淞沪抗日呀！我们的民族真是多灾多难。记得在“五·卅”惨案中，蔡公时在济南被日本人割了鼻子；“九·一八”事变前张作霖被日军暗杀，此后不久，东北沦亡，白山黑水，哀鸿遍野……堂堂中华民族，四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竟受日寇如此欺负，实在令人义愤填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有志男儿都以报国为荣。此时我便萌发报国之心。

在中小学以及师范学习阶段，我算得上是一个神气人。一是我上学迟，年龄大一点，比别人多懂一点事；二是家庭影响，学习用功，学校举行书法、绘画比赛，壁报栏里总少不了我的作品；三是体育比赛，我总是名列前茅，常常张榜

公布，得奖不少。老师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小学体育教师林春晖，省立莆田师范应届毕业生，我经常到他住处去玩。他父亲在南洋经商，一九二八年四月，来信叫他毕业后去南洋工作。五月份，他突然被捕，很快就被枪毙，传说是“二十八生（共产党）”。杀害他的是反动旅长林寿国，此人是屠夫出身。我幼小的心灵因此涌上惋惜、怀念、悲愤之情。在同学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郭嘉桂，现名郭风，福建省文联主席，他的才学很高，文章写得很好。在上师范时，常在校刊上发表文章。

一九三六年我师范毕业，年已二十三岁，与几个同学商量，决定到南京报考大学。八月初离家时，正值台风季节，小火轮本应靠岸航行，但因卖桂元的商人要抢时间，故远离岸边直线行驶，船颠簸得非常厉害。同行的两位同学都吃不消了，唯有我这个体育爱好者没有晕船。到上海外滩登岸时，满眼高楼大厦，我才觉得祖国之大，江山可爱，方信“好男儿志在四方”的豪言壮语并非谬误。

到了南京，我们觉得报考中央政治大学没有把握，报考中大体育系又没有前途，后来决定投考黄埔军校（十三期）。报考军校也不容易，当时赴宁报考的有一千八百多人，先进行初试，录取五百多名，然后汇同各省保送来的一千五百多人进行复试。各省保送的学生，大都是有来头的。最后正式录取大约一千三百五十人，我们三人中只有一人落榜。我入军校时，校长为蒋中正，名为校长，但并不经常到校，只有象举行毕业典礼等重大活动时才来。教育长是张治中将军，他英俊潇洒而文雅，在同学中威望很高。军校一切重大事务都由他亲自抓，因此，我们见面的机会也比较多。半年以

后，他调任湖南省主席，大家对他都依依不舍。接替张将军的是陈继承中将。陈继承将军胖胖的，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缺乏军人威武的风度。学员认为他没有什么本领，有点瞧不起他。入校后，我感到印象最深的是营舍布局合理，整洁适用，具有军事特色。以一个连队为例，其排列顺序是连长室、军械室、（事务长、传令兵、司号员亦居此室），指导员及副连长室、排长室（三人）、班长室（六人），学员分三排，每排住一个教室，排、班长分住学员寝室的隔壁。每连前面有篮球场、排球场，还有单、双杠等器械。我被编入第一营第一连，营长为上校衔，名字记不清了，人长得胖胖的，平易近人。连长叫汪逢渠，黄埔军校四期毕业生，中校军衔，其人精明强干，和葛可亲，一九三七年五月我们分科时，他已提升为上校。排长叫刘博文，上尉军衔，黄埔八期毕业生，穿着讲究，中等身材，五官端正，训练有素，显得很神气，听说还是一位华侨子弟。班长欧阳卓，为人忠厚，黄埔十期毕业生，湖南人，很有抱负，曾想报考陆军大学。

入伍教育阶段开设的课程为基础课和专业军事训练课。基础课主要学习数、理、化和外语。军事课主要是“制式”训练，先进行徒手的操练，后进行携枪操练，此外还有纪律教育，实兵指挥，野外演习，实弹射击，劈刺等科目。

学制为四年，入伍教育半年，分科教育一年半，军官教育两年。

分科教育主要以学专业知识为主，当时分步、骑、炮、工、辎五科，其中骑、炮、工、辎为特种兵，根据身体和素质条件，我学的是骑兵科。作战时，骑兵的主要任务是侦察敌情与掩护退却，为军中之耳目，配合大部队作战。以后发

展为机械化，但山地战仍需用骑兵。

军官教育主要学习四大教程（即兵器、筑城、交通、阵中勤务令），联合作战演习，作战指挥，制订训练计划等。教官大都为老“保定”和陆大毕业生。

九月份开始入学，训练极其严格，如集合稍迟，要罚站，两腿半分弯，同时双手持枪上举，打架、超假要关禁闭，内务不整洁，生活学习用品不按规定放好要打手心。记得一排有个姓竺的同学，大约是纨绔子弟，经常迟到，经常挨罚。受罚时，气氛森严，我们笑都不敢笑。有一次，我在教室上自习，突然响起集合号，我立即飞奔而出，钢笔都来不及插好，不想一位同学端着面盆飞跑过来，我被撞倒在走廊的水泥地上，整个脊椎都痛得发麻。这种训练现在看来，可算是“军阀作风”，“法西斯式教育”之类了，但冷静地评判一下，对养成严明的军纪和良好的作风，还是不无益处的。

政治教育一般由指导员负责，其内容是“军人的天职”、“忠于党国”、“忠于领袖”之类。入学三个多月，发生“西安事变”，军校内可不同外界，气氛极其忧郁，师生都很关注。记得消息传来，师生中有不少人为之痛哭流涕，大家认为：万一校长有什么不幸，我们的前途难以预料。后来和平解决，大家这才放下心来。蒋介石回南京后，曾到军校来与师生见面。因为礼堂小，十一、十二期学员站在礼堂里，我们十三期的学员站在礼堂外的操场上。蒋介石讲了些什么，我记不清了，只记得他临走时，站在孙中山先生像旁向大家招手致意。一九三七年初夏，我在明故宫机场又一次见过蒋介石。当时他正过五十岁，印象最深的是飞机

在空中飞行，组成“中正”两个大字，庆祝活动十分隆重，在当时可以说是哄动了全中国。

我在军校时，团长是陈联璧少将。陈将军身材魁梧，眼神有力，既威严又亲切，经常深入连队了解情况。一九三七年元旦，我加入国民党。这时南京下了一场多年未见的大雪，天气严寒，我们正在教室里上自习，陈团长突然来到我们连队，他问连长，为什么不抓住这个好机会进行锻炼？顿时我们全连官兵开展了一场“雪战”，陈团长一直站在寒风中笑着看我们，我们感到这是他给大家进行的一次深刻教育。

翌年三月，开始分科教育，原定为时一年半，由于卢沟桥事变发生，抗日战争爆发，学制需要压缩，军校也开始内迁，经芜湖、九江、武汉、长沙，行军至四川铜梁。这时学校的政治教育内容主要是：“一切为了抗战”。到四川时，教育长由范汉杰将军担任，一九三八年十月我们毕业时，他来参加毕业典礼。范先生是南方人，黄埔第一期毕业生。他来时，身着戎装，脚穿马靴，显得年轻有为，令人敬仰。我毕业后，留校工作，为时不长，即于一九三九年3月调至昆明空军军官学校工作，任区队长。高邮县国民党空军烈士万钰是我教过的学生之一。该校十二期、十七、十八期的学员都是我的学生。当时的教育长为周至柔将军，教育处长是王叔铭先生。王先生任处长时间不长，后调成都空军军士学校任教育长，不久升为空军司令。除周至柔、王叔铭将军外，还有一位毛邦初先生，他们三位在空军中都是有影响的人物。在昆明空军军官学校工作时，我一度与王叔铭先生接触比较多。当时空军有个淘汰生转学班，学员情绪波动很

大，甚至把意见一直提到航委会。王先生兼任转学班班主任，我当时任转学班学生队副，经常转呈学员的请求报告给王先生。王先生有魄力，处理事情很干脆，许多问题，一经他过问，一般都能很快解决。我这个人不会逢迎拍马，尽管有人羡慕我常与王先生接近，但我并不因此而被另眼相看、受到提拔。以后接替周至柔将军做教育长的有张有谷和刘牧群先生。

一九三九年十月，我觉得虽在空军工作，但不是“天上飞的”，不吃香，便要求参加楚雄分队学习飞行。因为我患痢疾，迟去了一个多月，所学的发动机学、空气动力学、气象学、无线电发报等课程，一下子赶不上去。我的自尊心又强，生怕人家讥笑，便以身体尚未恢复为由，要求回原单位工作。

一九四三年三月我参加了国民党空军十六期在拉哈尔（现巴基斯坦的首都）学习飞行。二十六人乘飞机飞经喜马拉雅山时，除飞行教官、西南联大的一个学生和我而外，其他二十三人都晕飞机呕吐，支持不住。当飞机从上空向机场下滑时，由于气压的变化，我们两耳轰鸣，非常难受。在拉哈尔学习期间，教我学飞行的是空军军官学校第十一期的学生，名叫萧道敏。有一次在空中练习飞行，他在前舱，我在后舱，他打手势我没有看清楚，他就打驾驶杆冲我发脾气。我想，你过去是我的学生，现在为这点小事怎么对我这样不礼貌，于是也不客气地打了一下驾驶杆回敬他，以后我就停飞了。回到昆明空军学校，我担任十七、十八期学生队副队长。同年八月我报考中央政治大学被录取，学习一年，此时经济上全靠同学支援，思想上极度不安。有一次考《三

民主义》，事先本无准备，考试时只好抄书，不料又被训育长当场发现，结果取消学籍。

一九四四年四月，我考取了国民党空军 B—24 第一批第二十三小组学习领航，当时毛邦初先生在美国任国民党驻美空军办事处主任。五月，我的朋友章武（字镜心）被空军军法处关押，戴上手铐脚镣，移送到陆军监狱。章武是黄埔六期毕业生，空军上尉。在昆明工作时，他任转学班的队长，与我玩得很要好。后来，他调升空军运输股股长。有一次，装载飞机汽油的船停靠在重庆朝天门码头起火烧毁。当时正是抗战期间，一滴汽油等于一滴血。按军法，押运员非杀头不可。但押运员早已逃之夭夭，章武这个运输股长也就成了替罪羊。我很重感情。为了营救他，我四处奔波，並找他的亲戚姚宗（字味辛，国民党中委）出来帮忙。半年以后，他总算定了案。但我却错过时机，没有赶得上美国学习，拖至第二年（一九四五年）春才去报到。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按照合同，美国不再训练领航员，我们这个小组遂改习空军军械。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我由新津乘飞机到上海，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日乘美国运输舰横渡太平洋赴美学习，在路上走了十二天半的时间才到西雅图。这对我又是一次考验。当时的舰艇不象现在这样设备好，在洋上航行，遇着大风浪颠簸比较厉害。同去的人很多都晕倒了，唯有我还是照样准时进餐厅吃饭。在西雅图休息一天，我们改乘火车到得克萨斯州的圣安多尼城。入伍训练三个月，再到丹佛城劳莱机场学习空军军械，为时八个月。然后又回到圣安多尼的开利机场实习三个月回国。

我在这整整十年的学习和工作中，凭着所见所闻，政治思想有了一定的转变，尤其是赴美学习期间，通过对比，看到我们国家的工业、交通都很落后，文化教育很不普及，科学技术水平又低，而国民党内部，政治上明争暗斗，争权夺利，经济上大括民脂民膏，依赖美援。还听说孔、宋家族已在美国大购不动产，把亿万财富存放在美国银行里，准备苟且偷生地当“白华”了。

一九四七年六月回到祖国，我被分在徐州203供应大队工作。当时解放军已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晋、冀、鲁、豫野战军（刘邓大军）于六月三十日在鲁西南地区强渡黄河，八月上旬越过陇海线，挺进大别山。华东野战军（陈粟大军），在打破重点进攻以后开始转入反攻。徐州虽是战略要地，但已失去相对的优势，人心、军心都发生了动摇。有一次，我亲眼看到饥民抢夺食物，国民党士兵虽用鞭子抽打，但也无济于事。我对饥民深表同情，更对内战发生反感，打算离开徐州。我父亲一九四五年冬去世，入殓时，连一条衬裤都没有。当时我在四川，无法回家。母亲一九四六年九月去世，当时我在美国学习，通信都很困难。鉴于上述情况，上级批我一个月假。途经上海时，我遇到在昆明空军淘汰生转学班学生队中的孙秉达上尉，当时他正在国民党上海空军供应司令部交通科当书记，恰巧他科里需要人。我请他帮忙调动。他对此很热心。我在家乡待了个把月，又找借口请求续假。等我经上海回徐州时，孙秉达已替我办妥调差之事。回徐不久，调令就到了，我遂于一九四八年初调到上海空军供应司令部工作，同年冬报升为空军中尉。

此后，战事急转直下，解放军连续取得三大战役的胜利。此时上海国民党军心大为涣散，士无斗志，物价飞涨，经济濒临崩溃。我们这一批去美国回来的同学，大都感到流亡台湾孤岛没有什么前途，思想上极其苦恼而又不安。全组共十八人，最后去台湾的只有七个人。有一次，留守人员中的甘自雄、谢野萍、陈常棣等破例地到我宿舍来玩。我是黄埔军校毕业生，又是去过美国的，我猜想他们以为我是嫡系，对我不放心，来玩是假，试探是真。此时，我隐隐感到共产党的地下党员有可能就在我的身边活动，我虽想与他们联系，但又不敢贸然寻问。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二日，解放军横渡长江后，上海很快成为孤岛，但与台湾仍有书信往来。有一次，得到台湾同人的一封信，说他们新近发了几块银洋。大约是谢野萍的鼓动，我和几个人一起去闹了财务科，终于争得了同等的待遇。这恐怕又是他们对我的试探。我们空军交通科的人员，被安排在最后撤离上海。当时上级给我们发了机场特别通行证（没有证是走不了的）。有一次，我和甘自雄闲聊，试探地问：“你有爱人和小孩，去台湾可不容易啊。”甘自雄装着漫不经心地说：“共产党来了还是要人工作的”。我心里也就有了底。五月十七日，我们已经清楚地听到了解放军的炮声。最后一架飞机即将飞离上海，上级按名单通知我们登机，因我不愿去台湾，所以我事先躲到朋友家里去，结来来人扑了一个空。

五月二十四日上午，我从虹口空军供应司令部到沪西朋友家，下午戒严就过不来了。二十五日全市继续戒严。二十六日大早，那天正下小雨，我赶到虹口驻地，陈常棣等已在

忙着造册上缴，甘自雄批评我小资产阶级思想严重。我感到很委屈，在一旁叹气，不再理会他们。过了几天，我在原空军闵行大楼缴出了一枝0.45毫米虎牌手枪。六月，上海市军管会通告没有去台的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到外白渡桥（原苏联大使馆址）登记。我准时去登记并上缴了有关证件。在以后的日子里，我曾参加上海市人民空军二十一厂工作，嘉兴油吨工程建设和南京航空学院的教学工作等，曾多次获奖。

“十年浩劫”中，由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推行极“左”路线，我们全家下放农村。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对我落实政策，我女儿按独生子女政策安排到县染化厂任现金会计，爱人也每月领取生活补助费。我退休后又获得了参加县政协活动的待遇。以我亲身经历，深刻体会到共产党对原国民党军政人员中爱国分子的政策是宽厚的。我们的祖国与解放前的旧中国相比，无论在工业、农业还是国防、科技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发展，这是有目共睹、举世皆知的。我们衷心希望，中华民族尽快结束分裂局面，消除隔阂，早日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为振兴中华统一祖国而共同奋斗。

高邮的联庄会

“联庄会”是国民党及日伪统治时期我县东部地区的地方武装。主要集中在四区和一、三两区的部分村庄。现将它的起源、发展、结局等概况综述如下。

一、联庄会的起源

一九三一年秋，洪水泛滥，高邮境内的运河大堤多处决口，运东大片田园淹没，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到严重损失。灾后，土匪横行，四区的柘垛镇就有一百余人的股匪，匪首刘文魁，自称“天下第一军”，到处抢劫，加上盐匪出没荡区，作恶多端，搞得民无宁日。而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政治腐败，官匪一家，更谈不上剿匪了。在此情况下，各乡保及士绅提出，“要过安稳日子，非办武装自卫不可。”首先是四区各乡保自筹资金，置办枪枝，遇有匪情，一处发出信号，各庄即来支援，逐渐形成了联庄会地方武装组织。后来，四区附近的一、三区部分村庄也纷纷筹办枪枝，组织联庄会。

一九三九年十月，高邮城被日寇占领以后，乡村盗匪蜂起，一些土匪和地痞流氓乘机作乱，伪军扩充队伍也四出抓丁、骚扰，搅得民众不得安宁。为了防匪、防伪，许多联庄会进行了整顿。四区南四乡（即是位于三垛河以北、横泾河

①
以南的保民乡、南屏乡、海陵乡、清廉乡）联庄会，由保民乡地主张朝柱出面整顿，在南屏乡的北王村召开大会，推举张朝柱为四乡总会长，金天祺、杨银山、张春台、李恒相分别为保民、南屏、海陵、清廉四乡分会长。参加四乡联庄会的二十三个村均推出代表为会员，负责管理本村联庄会。他们还制订了组织、奖惩和抚恤等条例。北五乡联庄会（即启东、茭荡、北极、横泾等）也在一九三九年冬进行了整顿，成立了北五乡联防会，推举徐守白、赵琴山为正副主任。

三
联庄会的枪枝来源：有的地方按田亩平均摊派，每甲集资办枪一支；有的则规定：有田六十亩的户应办步枪一支，三十亩的两户合办一支。但大部分枪枝是从国民党溃兵手里买来或缴来的。如：南京沦陷以后，有一批国民党军队流落到高邮湖西一带，经人介绍，四区顾家桥、贾家舍等村庄的联庄会就向他们购买了两挺机枪和十余支捷克式步枪。一九四〇年十月，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的八十九军在黄桥被击败后，部分溃兵逃到我县三郎庙，一些军官便偷偷地将二十余支捷克式步枪和二千余发子弹卖给了启东乡的联庄会。这样，仅四区联庄会就有枪一千多支。三区联庄会也有四百多支。

二、联庄会的斗争

联庄会不仅防匪防盗，而且抗击国民党军队的骚扰。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东北军于学忠部下杨开多的十二名溃兵经过三垛至南甘垛时，抢劫民财，被当地联庄会包围起来，打了两天两夜，俘缴了全部人枪。高邮和兴化沦陷后，联庄会也曾进行过一些抗日斗争。如：一九四一年五月二十六日，伪军一个连约六十人在连长田文生的率领下由临